

滬西扶輪社社員--孫瑞璜

開明睿智、追求光明的金融家

中華扶輪史研究員 劉敬恒

2023年12月1日



孫瑞璜(Sun Rui-Huang, MA (Columbia), BA (New York))(1900—1980)，新華信託儲蓄銀行副總經理、大安保險公司董事長、上海市銀錢業業餘聯誼會理事長，是滬西扶輪社(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)現職社員。滬西扶輪社是上海第2家、中華民國第32家扶輪社，在1948年11月16日加盟國際扶輪(Rotary International)，不過兩年多後在1952年1月24日全面解散。



孫瑞璜，名祖銘，字瑞璜，1900年11月2日出生在大清國江蘇省上海縣崇明島。1917年(民國六年)上海滬江大學(University of Shanghai)附屬中學畢業，考取北京清華學校(Tsing Hua College)，1921年畢業，公費赴美國留學。先後在紐約大學(University of New York)和哥倫比亞大學(University of Columbia)攻讀銀行學，分別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。

1927年學成回國，他先後擔任南開大學教授、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總稽核、郵政儲金匯業總局會計處副處長等職。

1930年新華信託儲蓄銀行(Sin Hua Trust & Savings Bank, Ltd.)改組，孫瑞璜應邀任副經理、副總經理。從此，他一心輔佐總經理王志莘對新華銀行進行整頓和發展，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孫瑞璜是位愛國銀行家。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孫瑞璜和章乃器、王志莘等金融界知名人士，率先參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國會，孫瑞璜積極參加籌募捐款、慰勞傷患和救濟難民等工作，發揮了很好的作用。

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上海公共租界淪為「孤島」。抗日救國活動在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中的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下，採取比較隱蔽的聚餐會形式，孫瑞璜也參加了星二和星四聚餐會的活動。在聚餐會上，他們瞭解抗戰形勢，交流工作情況，討論籌募捐款，營救被捕人員和救濟難民等工作。

1938年秋孫瑞璜和陳鶴琴、姚惠泉、李文傑等人發起組織「節約救難委員會」，向各界人民募捐，實際上是為新四軍徵募寒衣。共募集捐款178,000餘元，按當時市價可購買寒衣35,700餘套，該款由孫瑞璜通過新華銀行秘密匯交皖南新四軍總部。1942年孫瑞璜和鄭振鐸、王任叔等人組織「復社」，編輯出版《西行漫記》(Red Star Over China)，後來以「魯迅全集出版社」名義，集資出版了《魯迅全集》二十卷，對宣傳社會主義思想起了很積極的作用。孫瑞璜還和趙樸初、李文傑等人發起組織「工商職員貸金處」，向各大銀行、企業募集基金。對工商業職工發放小額無息貸款，幫助職工解決戰時生活困難。

1949年初，白色恐怖籠罩上海，孫瑞璜和盛丕華、吳承禧等人參加了民主建國會的周邊聚餐會。當時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，孫瑞璜、陳巳生、李文傑、趙樸初等人還參加了以顏惠慶為主任委員的「上海臨時救濟委員會」。準備籌集經費和物資，收容戰時難民。在臨近中國共產黨勝利前夕，上海不少工商界知名人士在國民黨政府鼓勵下，紛紛離開上海前往臺灣或香港。孫瑞璜不為所動，寧願放棄早已決定的赴美國考察、與在美國講學的夫人王國秀會面機會，堅決留在上海迎接中國共產黨建政。他和總經理王志莘向職工代表堅定表示，銀行方決定，個人可以自由去留。銀行機構不撤不遷，已通知總分行負責人一律執行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，新華銀行的機構、人員以及資產都完整地保留下來，並立即成為首批公私合營銀行之一。孫瑞璜被聘為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委員，並被推選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、中國人民赴朝鮮慰問團成員。

最初幾年，新華銀行在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和支持下，貫徹執行國家的金融政策。扶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企業，溝通公營和私營金融業，發揮了積極作用。新華銀行本身也得到更大的發展，業務居所有合營和私營銀行錢莊的首位。

1952年末，金融業全行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，合併組成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。孫瑞璜和其他金融業者一起，發揮了骨幹帶頭作用。歷任公私合營銀行常務董事，上海分行副經理、經理；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儲蓄處副處長、副行長、顧問等職務，還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至第五屆和第七屆人民代表；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；上海市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副秘書長、顧問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；中國銀行董事。

在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中(1966-1976)，孫瑞璜身心雖受到嚴重摧殘，但他仍然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，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。他曾寫信給在香港的金融業者，介紹祖國金融事業的新面貌，勸導回來一起工作。他還十分關心臺灣回歸祖國，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。長期以來，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。

孫瑞璜晚年長期患腦血栓，後又患膽結石。孫瑞璜對清華母校非常關心，曾任上海清華同學會會長多年。1980年《清華校友通訊》復刊之初，孫瑞璜於4月6日，即逝世前一個月，在重病之中親筆致函母校聯繫，贊助人民幣100元表示支持。

1980年5月9日因醫治無效，不幸逝世，享年80歲。

開明睿智、追求光明的金融家

記大安保險公司董事長、上海「銀聯」理事長孫瑞璜

《中國銀行保險報》 隴右泉 2023年2月17日

經受「五四」洗禮的清華學子、金融海歸

孫瑞璜(1900-1980)原名祖銘，字瑞璜，上海崇明縣人。年少聰穎，好學不怠，樂學不倦，在人們眼中是妥妥的學霸——1917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附中，並以優異成績考取北平清華學堂。孫瑞璜常懷憂國憂民之心，思謀拯救之策，年輕時就產生樸素的民主革命思想。他渴望儘早成才，匡時濟世，喚醒國人發奮圖強。1921年，孫瑞璜自清華學堂畢業考取赴美庚款留學機會，先後在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銀行學，分別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。

1927年，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，他婉拒了老師推薦留在美國就業的優厚待遇機會，義無反顧回國，先赴天津南開大學教授會計學，為國育才。1928年6月，孫瑞璜經校友學兄、同為哥倫比亞大學銀行學碩士的江蘇省農民銀行副經理王志莘引薦，赴南京政府建設委員會任總稽核。本想在公位上施展抱負為國效力，但因看不慣所處官場的內鬥與腐敗，很快就自動離職，棲身上海郵政儲金匯業總局會計處出任副處長。

據掌握的史料，與他先後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校友的保險業界精英，幾乎是民國時期大半個金融界精英圈，是不容小覷的海歸實權幫。

總結20世紀中國保險業的逆勢崛起，一方面是因為「黃金十年」裡，民心思定，百業興旺，另一方面也因為有一批在歐美日留學的人才精英學成回國。海外留學，西學中用，這是最快縮小發展差距之捷徑。1930年10月，王志莘辭去江蘇省農民銀行總經理職務，應馮耿光、張公權及唐壽民之邀，赴上海接任新華信託儲蓄銀行總經理——該行原稱新華儲蓄銀行，由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合資，1914年創設於北京，開辦時實收資本僅15萬銀元，1917年增至50萬銀元，改稱新華商業儲蓄銀行（以下簡稱「新華銀行」）。經營守舊，業務不景氣，業績不尷不尬，1928年，新華銀行經營管理不善，放賬過濫，資本虧蝕殆盡，負債淨額高達600萬銀元，瀕臨破產。1930年，經理方仁元向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告急，兩行下決心徹底改組：將舊股折合為20萬銀元，各再入股90萬銀元，資本總額合為200萬銀元，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兩行占股92.2%掌握決策權，決心刮骨療毒，次年將總行遷至上海，聘王志莘為總經理，即是希望能夠大刀闊斧改革，使新華銀行起死回生。

核心組合，再造服務社會之「新華」

功以才成，業因才廣。在王志莘的力薦邀請下，孫瑞璜出任該行副經理，結成肝膽相照、榮辱與共的新華銀行完美搭檔。

新華銀行二人核心組合的第一舉措，是踐行歐美銀行的現代運營辦法，廣攬儲蓄，運用銀行的資金融通功能服務社會。

首先在《改組宣言》中向社會昭告新華銀行「提倡社會儲蓄，培養人民儉德」之宗旨：運用銀行的資本與信用，吸收社會閒散資金，用於投資和放款，挹注實業改造，造福於社會。為此他們沉疴下猛藥，革新人事，激濁揚清，延攬眾多英才擔任重要職務，這些得力幹將多有留學歐美經歷，有的還兼任大學教授。堅持以「德才兼備」招考大、中學校畢業生，唯賢是舉錄用行員。「中文拼音之父」周有光留學日本經濟學專業後回國在大學任教，曾任職新華銀行，派駐紐約；張元濟之子張樹年，紐約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，亦到新華銀行履職。

據 1948 年底的統計，該行職員中曾受國內外高等教育的占 48.1%，受中等學校教育的占 50.4%，二者合計共占全行職員的 98.5%，平均年齡不到 30 歲。他們經過嚴格的考試或培訓，擁有服務至上的現代金融理念，富有朝氣，工作積極，精明能幹，杜絕了官僚作派和市儈習氣。一時間贏得口碑，社會輿情普遍評價新華銀行較為新派，高層有學者風範，經營得法。

新華銀行是中國最早重視有獎儲蓄吸納民資的銀行。他們以人為本，依據國民日常經濟生活需要來拓展儲蓄業務，最大限度地挖掘儲金資源，首創有優厚利息的生活儲金、教育儲金、人壽儲金、禮券儲金等，規定期限一年，月息一分，在處理紀念儲金手續時力求簡便貼心。比如，力主倡辦活期儲金、零存整取儲金、整存整取儲金、整存零取儲金、存本取息儲金、定活兩便儲金、每月存多少不限的儉約儲金、子女教育儲金、寓保險於儲蓄的人壽儲金等，並利用報紙雜誌及櫥窗佈置大張旗鼓地宣傳，贈送新穎別致的儲蓄罐等小禮品，以擴充儲蓄客戶，集聚閒散資金，儲戶曾多達幾十萬戶。新華銀行除經營儲金業務，還不嫌瑣屑，設立服務部，興辦信託、倉庫、外匯等服務專案，甚至開辦代收學費、代收公用事業費等各種代理業務，與中小工商業融洽關係，這些舉措頗見成效，打造了新華銀行東山再起，業務增長神速的奇跡。新華銀行印發的禮券是一種全新金融產品，足額行用，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鈔票，能在多地使用，可買各種商品，兼具儲蓄功能，達到一定時限還可計息。

孫瑞璜把新華銀行視為自己的終身事業，仿照美國大通銀行的管理制度，殫精竭慮，科學規劃。他沒有官僚習氣，平易近人，經常走出行長室，到各個相關辦公室營業場所走走看看，掌握最新動向，及時解決工作實際問題。並且最為強調凝聚力，講究人情味，生活上從不講排場，與銀行員工情同家人，非常重視人文修養培養，打造「新華精神」。要求員工視銀行為自己的家園，安身立命，為「家」爭光，大家庭當然也會關愛員工，推出暖心舉措，免費門診，設立互助金、養老金、殘廢給養金、撫恤金等額外福利，每年加薪，對工作滿 20 年的老職工，贈送「歐米伽」金表，修建職工宿舍，解決職工切身困難。他還資助優秀員工帶薪出國深造或考察，在增資擴股時贈予職員「同人股」，使員工與銀行休戚與共。

在核心二人組的精心擘畫苦心經營下，新華銀行改頭換面，彰顯出「以新精神賡續舊生命」的良好開端。1934 年，由上海新華銀行編印《新語》半月刊，設同人消息、行務紀要、總務通知、各地通信、社評、半月見聞等欄目，為交換意見，溝通資訊，共謀行業發展而搭建起平臺，供同業閱讀。由於半月刊貼近工作生活實際，實用性及可讀性強，頗受同人歡迎。

務實的經營措施，開放的人事管理，使新華銀行於改組當年就扭虧為盈。1936 年底，存款總額增加到 1,436 萬元，比改組前的 1930 年增加近 7 倍，各項放款比改組前增加了兩倍；各項投資也多達 1,165 萬元，銀行實力日益雄厚。除了平津分行外，又相繼在南京、廈門、廣州三地設立了分行，僅在滬市區內就新設了 4 個辦事處。日漸殷實的資力和日臻完善的管理措施，使新華銀行成長性極強，在金融界的地位飆升，被譽為「南四行」之一，是上海銀行業公

會 200 多個會員單位中處於領導地位的 10 家大銀行之一。

創業之初，孫瑞璜與昆山大家閨秀王國秀結為伉儷。1932 年 1 月 28 日，日軍大舉進攻上海，孫瑞璜和王國秀夫妻在大夏新邨的溫馨家園被日軍炮火夷為平地，只能棲居靜安寺新華園 37 號小樓內。

躬耕復社，為文化抗戰經濟抗戰助力

早在 1935 年 12 月，孫瑞璜就在《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國宣言》上公開簽名，響應中共中央的《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》，協力推動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蓬勃興起。國仇家恨驅使孫瑞璜經常參加各種形式的抗日民主聚會，尤其是「星一聚餐會」——這個以每星期一晚間聚餐一次為活動形式的愛國名流沙龍，以「促進文化，復興民族」為己任，代表了「自由上海」各界「開明」與「正直」的力量，是黨領導的統戰組織，孵化出中共黨史上赫赫有名的復社。

據鄭振鐸回憶錄，孫瑞璜是復社的早期核心成員之一，很少缺席。孫瑞璜曾經參與了中共江蘇省委文委領導的《每日譯報》及旗下刊物的創辦、編輯、撰稿工作，與鄭振鐸、王任叔、馮賓符等熟知，自然而然躋身「星一聚餐會」群體，1938 年 1 月，《每日譯報》由夏衍、梅益和王任叔發起改版。在這樣的聚會上，孫瑞璜結識了一大批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，也有機會與國際友人愛德格·斯諾、路易·艾黎(上海工部局工業科科長)相識。

1936 年 6 月，愛德格·斯諾赴陝北革命根據地作實地採訪，向英文報刊報導中國工農紅軍以及紅軍領袖、紅軍將領的情況，如實宣傳中國抗戰實際，撰寫了轟動全球的傑作《紅星照耀中國》(又名《西行漫記》)，1937 年 10 月在倫敦結集出版。

依靠復社成員的協力支援，《紅星照耀中國》的翻譯、編輯、印刷在不到 3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，裡面也凝結著孫瑞璜的奉獻。1938 年 2 月，中文版《西行漫記》在上海出版，照片從英文版的 16 張增至 51 張，轟動了國內外，向世界拉開了紅色中國的帷幕，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正面形象走向世界。

孫瑞璜參與「星一聚餐會」主導推展諸多愛國事宜——凡有利於抗戰的事情，他們均竭誠去做。在「星一聚餐會」上，他們交流抗戰形勢，討論聯合抗戰，商議籌募捐款，營救被捕人員和救濟難民等，這種共赴國難的私誼維持終身。

1938 年秋，孫瑞璜與陳鶴琴、姚惠泉、李文傑等人發起組織「節約救難委員會」，向各界人民募捐，實際上是為新四軍徵募寒衣，共募集捐款 17.8 萬餘元，按當時市價可購買寒衣 3.57 萬餘套。該款由孫瑞璜通過新華銀行網點秘密匯交皖南新四軍總部。

為救濟職工戰時生活困難，孫瑞璜還和趙樸初、李文傑、梅達君等人發起組織「工商職員貸金處」，向各大銀行、企業募集基金，對工商業職工發放小額無息貸款，幫助職工解決無妄之災形成的生活拮据，資助千餘名難民愛國青年，籌措秘赴革命根據地的經費，為許多中共地下黨員解決經濟難題。

孫瑞璜響應並主導助推大後方的「工業合作運動」。正是在 1937 年 11 月的「星一聚餐」會上，愛德格·斯諾夫婦提議發起「工業合作運動」。他們認為抗戰將是長期的，而且主要是遊擊戰，所以應以合作社方式動員大後方的人力物力，推行小規模工業，從事日用工業品及簡單武器的加工，供應軍需及民用，以支持抗戰。這次會後，就由「星一聚餐會」組成「中國工業

合作社設計委員會」，推舉當時在場的紐西蘭人路易·艾黎為這個委員會的召集人，草擬工合運動計畫。這一倡議得到宋慶齡、周恩來和當時美國駐華大使的支持和鼓勵，宋慶齡任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，在各種抗日進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，發起後來被讚譽為「經濟國防線」的「工業合作運動」。復社成員也力所能及地鼎力協助。這場戰時生產自救得到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支援，全國工合機構也成為隱蔽、聯絡各地中共地下黨同志的可靠聯絡點。

孫瑞璜不遺餘力資助進步書刊的出版發行。《西行漫記》《續西行漫記》轟動了國內外，多次再版，國外不少出版社紛紛翻印，在海內外華人華僑中引起轟動。這本書所激起的巨大波瀾，大大超出了復社社員的預料。在《西行漫記》的影響下，大批愛國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，如「銀聯」「保聯」的許多戰友，受此鼓舞，投身抗日前線。孫瑞璜還參與資助復社出版《魯迅全集》20卷，接辦過夏衍、梅益等創辦的《譯報》。

在整個抗戰期間，所有參加「星一聚餐會」之成員堅守民族大義，沒有一人墮落為漢奸，沒有一人向敵人告密出賣抗日力量，甚至抗戰勝利以後，在國民黨發動大規模內戰期間，也沒有一人站到蔣介石獨裁政權陣營一面。

擔當上海銀錢業群眾聯誼組織的領頭人

隨著新華銀行聲名遠播，孫瑞璜的社會地位也日益提高，不少工商企業都邀請他擔任董事長或董事等。1946年後，孫瑞璜先後投資擔任博士金筆廠、大華綢業公司、大安保險公司、中國萃眾製造公司、科學化工廠董事長，以及中國國貨公司、大中華實業、新中實業、光華百貨、振豐棉織廠等眾多公司董事。他也義不容辭地在金融業界公益事業中嶄露頭角，發揮了示範帶頭作用。在特務眼中，孫瑞璜是被共產黨染紅了的金融家，因為令國民黨政權不爽的事情，他經常出頭參加，並且影響力巨大。

「上海市銀錢業業餘聯誼會」是1936年10月由張人俊（即張承宗，中共上海地下黨傑出領導人，20世紀60年代曾任上海市副市長）、邵君美、金惠民、張困齋、周晴、韓宏綽、袁君實、方孟仁、梁廷錦、林震峰等中共地下黨發起創建、主導運作的金融業職工群眾組織、愛國救亡團體。以「聯絡感情，交換學識，改良業餘生活，提倡正當娛樂，增進服務效能，促進銀錢業業務」為宗旨開展聯誼，順應了行業同人的訴求。為提升號召力，1938年6月，由秘書處主任邱叔麟（即楊森培）拜訪邀請，經胡宣同借用長兄胡孟嘉的相知關係協助爭取，會員大會公推孫瑞璜擔當「銀聯」第三屆理事會主席，他開始扮演「銀聯」守護神。

上海「銀聯」的文獻資料

1938年秋，「銀聯」突接租界當局勒令閉會的通知，巡捕房也派人到會所查封。孫瑞璜就以「銀聯」理事會主席名義赴工部局進行解釋，申明兩年來開展正當業餘文體娛樂活動的事實，並請好友徐寄廬（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）以工部局華董身份出面疏通，再由銀行、錢莊兩家同業公會聯名擔保，拿到了工部局的登記執照，為「銀聯」贏得租界當局的註冊許可和金融管理層的合法認同。

「銀聯」自第三屆至第九屆由孫瑞璜、王志莘擔任理事會主席，聘請熱心公益事業之金融業高層徐寄廡、錢新之、秦潤卿、潘仰堯、蔡承新、裴雲卿等 65 人出任名譽理事，倚重他們的號召力和人脈，廣泛吸收銀錢業上層人士參加，使「銀聯」的影響力、凝聚力空前提升。

「銀聯」以會員福利性質的文化補習及文藝體育為抓手，因勢利導，採用豐富多彩的聯誼形式，創新活動載體，用暖心舉措豐富業餘生活，釋放工作壓力，更是產生了集群效應，活動熱度顯現，向心力倍增。而上海地下黨則奉行「蔭蔽精幹」，利用合法掩護開展秘密工作原則，安排黨員骨幹擔任「銀聯」及會務部門的負責人，撐起大樑，播撒革命火種，得道多助，贏得業界廣泛支持，經過多次徵求會員運動，從發起時的 20 多人，到 1939 年規模已超萬人，最多時達 1.5 萬名會員，激揚蓬勃氣象，促成金融行業主流共識，凝聚起澎湃力量。

孫瑞璜經常在「銀聯」聚會上發表演說，為出版的《銀錢報》《銀錢界》及會員大會特刊作序，撰寫文章，激發愛國擔當，鼓勵銀錢業職工克服戰時困難，樹立對國家和事業的信心，以迎接戰後復興時期的到來。

在孫瑞璜身體力行示範下，新華銀行總行營業室經理徐振東和分行處室經理陳鳴一擔當「銀聯」會員徵求運動隊的隊長，主管人事的總秘書嚴景耀也傾力襄助，職員中加入「銀聯」會員的人數超過職員總數的 80%。

孫瑞璜連任第三屆至第六屆理事會主席，抗戰勝利後王志莘返回上海，出於對王志莘的尊重，孫瑞璜就主動讓賢，不但新華銀行的一切工作悉由王志莘決斷，即便在社會活動中也力推王志莘，1946 年 6 月，在「銀聯」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上孫瑞璜就積極推薦由王志莘繼任理事長，並連任兩屆，而自己改作副理事長全力輔佐。新華銀行核心二人組出任「銀聯」法人代表十餘年，任職期間，「銀聯」密切團結進步上層人士與廣大職工，弘揚正氣，做了許多有益國家的事情。

交際能力非凡的黃定慧（即以「最美紅色女特工」名噪當下的黃慕蘭，1926 年入黨，1931 年以中共中央「特科」人員身份及時通報向忠發叛變情報、參與營救關向應，1933 年後脫黨。1938 年時任通易信託公司複業的實際控制人），從第三屆開始至第五屆，擔任「銀聯」常務理事、秘書處主任兼同人福利委員會主任，口才奇佳，能力突出，在做好金融上層人物統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新華銀行的多元化經營獨具慧眼，投資創建的新孚股票公司經理證券業務、新原物產公司經營房地產業務，均蓬勃興旺。新華銀行投資挹注的中國國貨公司、鴻興織造廠、美亞絲綢廠等工商企業被稱為「國貨幫」，他們設立國貨商場和國貨年，舉辦國貨陳列會，自發投身抵制日貨，提倡國貨，共紓國難的「實業救國」行動。

私立復旦大學欲通過銀行貸款和向社會發行公債等形式，解決興建新校舍維持學校運轉所需資金空缺問題，在孫瑞璜與時任新華銀行襄理徐樹聲（1921 年復旦商科畢業校友）的斡旋下，新華銀行作為公債的擔保與承銷機構，興教助學，回報社會。1933 年 9 月，復旦大學在上海公開發行年息一分、期限 5 年的建築公債 4 萬元。此舉首開私立大學發行公債之先例，轟動一時。
